

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

方汉奇自选集

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53/91
:11
2007

方汉奇自选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汉奇自选集/方汉奇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
ISBN 978-7-300-08357-5

- I. 方…
- II. 方…
- III. 新闻工作-文化史-世界-文集
- IV. G219.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8018 号

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 方汉奇自选集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44.75 插页 4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19 000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总序

纪宝成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教师是立校之本，发展之基，是学校最可宝贵的财富。

中国人民大学在七十年发展历程中，汇聚了一大批声誉卓著的学者、名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论风雨沧桑，始终以一腔赤子激情执着真理，追求光明；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倾毕生心力于教学，培养了一大批共和国优秀的建设人才和领导人才；他们笔耕不辍、严谨治学，成就了一大批堪为精品、上品的传世之作；他们潜心书斋，淡泊名利，不仅成为授业解惑的“经师”，更成为明德传道的“人师”。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凝聚成了具有人大风骨、人大气派、人大风格，并为中国人民大学世代传承的教风、师德，成为学校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源动力。没有他们鞠躬尽瘁、默默奉献，就没有中国人民大学今天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没有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为了彰显这批名家、学者们的学术贡献，传承他们的精品力作，进一步发展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我们特选择在中国人民大学七十周年校庆之际，隆重推出首批著名教授具有代表性的

学术成果自选集。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丛所辑录的成果都是这些学者名家从自己数十年来已发表的文章或著作中精选而来的，凝聚了他们毕生的心血，很多见解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虽然其中一些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不可避免地含有争议未决的理论观点，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学者名家们数十年执着探索的运思轨迹，展示了学术研究、理论发展的历史风貌。从中我们可以真实地体悟到一种以细针密缕之功、做平正笃实之学的研究精神，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份胸怀祖国、情系人民、关注时代的仁者情怀。应当说，“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既是学校数十年学术发展历程的总结，又是学校脊续血脉，进一步探索创新的起点。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既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保持生机活力，得到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推出这套文丛的最终目的，也正是期望这份厚实的文化积淀能够在传播知识、传承精神的同时，成为帮助和鼓励后学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理论资源和精神动力。本着这个目的，在首批推出 28 本名家文丛之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一系列学界中坚的个人文集，以期通过这种平实但富有建设性的行动，催生新的理论、新的观念，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之树长青！

“学术常青校运昌”。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的出版，必将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在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征程中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

前 言

收入这部选集的，基本上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所写的和中国新闻史研究有关的文章。

我是1946年考入大学新闻系的。当时的愿望，是想当新闻记者。在校学习期间，学过新闻史方面的课程，也写过一些有关新闻史的小文章，对新闻史产生过一点兴趣，但并没有放弃当一个新闻记者的追求。1950年毕业离校后，被当时的系主任马荫良先生拉到由他负责组建并担任馆长的上海新闻图书馆，担任研究组的馆员，分派从事旧报史料的整理工作，这才彻底放弃了当记者的梦想，开始和新闻史打上了交道。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系主任黄嘉德先生，知道我对中国新闻史作过一点研究，小有体会，就邀我去给学生们讲点新闻史的专题。由此开始了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尝试。但当时还兼着上海新闻图书馆的任务，还不是全职的教学工作者。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又随北大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地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这两个学校，主要承担的都是中国新闻史这门课的教学任务，这才成为正式的中国新闻史的教学工作者。从那时到现在，除了“文化大革命”开始

的头几年外，我始终没有离开中国新闻史的教学岗位，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算得上是这个园地的老园丁了。

五十多年前，在我刚刚开始接下中国新闻史这门课的教学任务时，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还是一片亟待开拓的处女地。前人留下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不多。还有很多缺口。为了编写教材和应付课的需要，我必须利用课余时间，跑图书馆，跑档案馆，看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走访老报人，对一些新闻史上的重点报刊和重点人物，作一点个案研究。用科研来保教学，促教学和填补教材的空白。为此，写了一些新闻史研究的小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在当时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这部选集中的绝大部分，就是从已发表的近 150 篇这类文章中筛选出来的。

需要说明的是，对我个人来说，五十多年的新闻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其道路，既漫漫而修远，也是崎岖不平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两多，政治运动多，研究禁区多。从一进北大起，我就相继赶上了思想改造、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胡适、整风反右、拔白旗插红旗等政治运动。到了人大以后，又赶上了“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右，我侥幸漏网。“文化大革命”则在劫难逃。其间，除了屡屡受到批判之外，还要按照当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不时地下去劳动。劳动是很愉快的事情，接触了工人和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思想意识筋骨体肤也都得到了锻炼，但用来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则大大地被打了折扣。“文化大革命”期间，游谈无根，束书不观，更谈不上研究。“左”倾路线思想指导下，人为设置的一些禁区，也给正常教学研究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收入这部选集的文章，其实大部分都是“文化

大革命”以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的。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带来新的契机，也大大地推动了新闻史研究的开展。

这部选集收入了40篇有关新闻史研究的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刊于1958年3月出版的《新闻战线》。最近的一篇，《〈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刊于2006年6月出版的《国际新闻界》。发表的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基本上反映了我在新闻史研究这一园地从事耕耘的历史轨迹。40篇文章，按其所涉及的内容，分为五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共收《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等六篇文章，表达了我对中国古代报纸历史的基本观点。我的新闻史研究，其实正是从古代报纸研究开始的。早在1948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曾经利用苏州图书馆的藏书和自己收集到的一些报刊原件，写过《两宋时期的新闻出版自由》、《中国早期的小报》等文章，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的报纸。后一篇文章还曾在1948年6月14日至8月23日上海《前线日报》的“新闻战线”副刊上连载。现在看来，那些文章显然都很稚嫩，只能算是初涉新闻史研究的习作，但也表明了我对古代报纸历史的关注。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历来有周、汉、三国和唐等几种说法。其中较权威的是起源于汉代说，如著名的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持这种说法。我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讲中国新闻史的时候，也曾沿用过这一说法，后来则倾向于起源于唐代说，这一板块的前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是在阐明自己的这一观点。目前，在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时间上，还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这三篇文章，提出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看法，读者可以参看持其他看法的文章，择善而从。这一板块的最后一篇文章《〈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是在承担了《清史·报刊表》的编写任务以后，根据编写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材料，写出来的。对传统的一些提法和看法有所厘清，有所修正，反映了自己在古代报纸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新的体会。

第二个板块，共收《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等九篇文章。涉及近代的几个有影响的重要报刊和报人。中国近代的报刊，数以千计，仅纳入《清史·报刊表》的，就不下2000种。同时期的著名报人，也不下1500人。这几篇文章所涉及的，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之一毛，只能算是自己对个别报纸和报人进行个案研究的一种尝试。其中有一些，是为编写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准备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新闻史研究，受国内收藏有缺失和图书馆限制较多，服务不到位的影响，经常为无米和少米之炊。改革开放以后，国际交流频繁，走出去的机会日益增多。新闻史研究的资料来源，趋向于多元化。我自己就曾经利用公私出访的机会，到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日本东京的国会图书馆、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东亚部、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查阅过报刊历资料。既开阔了视野，也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收入这一板块内的《东瀛访报记》（上）（下），既是对日本收藏的中国近代报刊原件的一次巡礼，也是对近代国人在日本办报情况的一次现场调查。对如何利用国外的收藏，完善我们的新闻史研究，也许会有一点启示。

第三个板块，共收《〈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等13篇文章。涉及现代的几个有影响的报刊和报人。其中，有关

鲁迅的两篇，写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当时写文章不兴署名，写完之后，曾被系里印成不署撰人的白皮书，分发给老师们参考。文字风格还隐约地能看出点那个时代的特色。当时和这两篇同时印发的还有另一篇，是写鲁迅如何批资产阶级报刊的，用了不少“大批判”的语言，带有无限上纲的“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就从略了。此外的11篇，全都写于1978年以后，或谈“中间报刊”，或谈此前被划为资产阶级报人或遭受冤假错案的一批现代史上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了它们和它们以符合实际的评价。写这一类题目的文章，实际上是在尝试着逐步地突破一些禁区。其中涉及的一些报刊和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7年，是上不了台盘的。要上，也只能当成批判的靶子。因此，从新闻史研究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的作用。

第四个板块，共收《中国加入WTO后内地报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四篇文章。主要是从新闻史的角度，研究当代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既谈到了入世对中国报业的影响问题，外国记者在华活动历史的问题，也谈到了新媒体发生发展历史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对互联网这种新型的媒体，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和影响，作了阶段性的考察。新闻事业在发展，新闻史的研究也要相应地发展。这一板块的一些文章，其实是对前几个阶段的新闻史研究的延伸。

最后一个板块，共收《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等八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闻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和新闻史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史学会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了一定评述。对前一个世纪，前一段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和得失，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

总之，收入这部选集的，都是和中国新闻史研究有关的文章。它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新闻史这块园地内，从事耕耘的历史轨迹和收获的部分成果。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学科，正在飞速发展。新闻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也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时期。研究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已经出现了“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的可喜景象。我在这个学术领域内，贡献不多。形象地说，只不过是某一片海滩上，捡拾了几个贝壳，在构建某一座大厦之前，作了一点基础的铺垫工作而已。作为一名新闻史的教师，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青胜于蓝。作为一名老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我希望后来者居上。收入这部选集的文章，倘能在上述的领域内，起到一点铺路石和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于愿已足了。

目 录

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 的报纸	1
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	31
跋《〈开元杂报〉考》	66
中国封建社会言论出版禁令考	72
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	89
《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	105
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	118
清末的《京话日报》	150
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	164
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	173
东瀛访报记（上）	193
东瀛访报记（下）	213
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	240
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	249
《清史·报刊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	274

《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295
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	309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	336
邵飘萍是共产党员	348
纪念邵飘萍	
——在邵飘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362
发现与探索	
——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	370
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	385
鲁迅的报刊编辑活动和他的严谨的写作态度	426
俞颂华先生二三事	441
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怀念俞颂华先生	449
一代报人成舍我	453
怎样评价胡政之	479
不为物移 不为己忧	
——纪念恽逸群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	486
中国加入 WTO 后内地报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493
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502
法轮功与互联网	509
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	
——对 100 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与反思	531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536
报纸与历史研究	558
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	568

七十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	588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建议	631
花枝春满 蝶舞蜂喧	
——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	647
骅骝开道路 鹰隼出风尘	
——记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六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	671
与时俱进的中国新闻传播学	689

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 “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

前不久，根据已故向达教授提供的线索，在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孙文芳同志的协助下，我高兴地得到了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抄件，这是孙文芳同志应我的请求，亲自到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根据该馆所藏原件誉录过来的。唐归义军“进奏院状”是斯坦因（Sir Aurel Stein）20世纪初从敦煌石窟窃走的珍贵文物之一。

这份“进奏院状”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距今约1100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有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对这份报纸进行过细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报纸的了解。

下面准备先介绍一下这份“进奏院状”的原文，对它的文字作一些疏证，然后再就它和中国古代报纸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报刊史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兴趣，也希望能够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这份“进奏院状”是向达教授 20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求学时，在当时的伦敦不列颠博物院首先发现的，是该院所藏斯坦因从我国窃去的 7 000 件敦煌卷子中的一件。据他介绍，这份“进奏院状”“存六十行，纸背为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六十四行”^[1]。孙文芳同志这次代我查看了原件，证实了向达的介绍，并在给我的信中作了以下的补充：“原件是一张长九十七公分、宽二十八点五公分的横条卷，纸张是白色的宣纸，比较坚韧，文字是自右至左上下书写的，字写得相当不错。仅存 60 行，后一部分已佚。”看来，原件如果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话，至少应在两页以上。

由于年代久远，这份“进奏院状”所报道的人、事和历史背景已经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加以“状”的作者使用了不少当时当地流行的俗体字、简化字、异体字和方言字（还可能有些错别字），读起来很有点佶屈聱牙。为方便阅览计，我尝试着作了一些疏证，但仍有不少句子索解为难。原文无标点，我试着作了一些标点。其中有一些段落因为断不了句，只好囫圇地放在那儿，以待高明。断错了的，也希望得到指正。

请先看它的原文：

(为了和后面的疏证对看方便计，保留了原文的行款，每行的前面都加了一个编号。文中的“□”，代表原件破损和看不清楚的字，是孙文芳同志抄录时加上去的)

(第一行) 进奏院 状上

(第二行) 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左：